

哲学中革命变革的起源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苏〕Л·Н·巴日特诺夫著

刘丕坤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 言

1844年是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发展中发生转变的一年。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向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立场。哲学观点方面的这种转变，就表现在马克思坚决同黑格尔左派的唯心主义决裂，开始根据唯物主义世界观来研究哲学问题。

马克思世界观发展中的这一转变是同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①直接联系着的。但是，1844年期间马克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进行的经济学和哲学研究在这方面也具有不小的意义。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得出了如下结论：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是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基础既归根到底决定着人跟自然界的关系，也决定着人跟人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整个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社会的整个精神面貌。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个研究使马克思得出了他的整个学说的基本思想——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成果，只是以手稿、摘要和个别批注等等的形式保存下来。马克思未能把他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并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发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跟《手稿》直接衔接的《经济学家摘录批注》^②（无论从

① 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译者。

②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Ökonomische Studien》），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柏林，1932年，第435—583页。

年月顺序来看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完全有理由认为后者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了给自己弄清问题而写作的。这种情况虽然为研究这些作品增加了某种困难，但却丝毫不会降低马克思的这些作品的价值，也不能缩小这些作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后来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仅巩固了马克思向新的阶级的和哲学的立场的彻底转变。由于《手稿》从无产阶级革命要求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点。《手稿》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做了概括的阐述，明确地规定了马克思其后许多年间的理论研究的道路。分析一下马克思的这部还很少得到我们研究的著作，可以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的起源，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来源、动力和形式，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

本书的任务就在于弄清楚《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且根据《手稿》提供的材料来研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点和哲学观点形成过程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著作对《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	1
第二章 异化劳动	28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基本特点	28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范畴的阐发	40
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各种矛盾的批判	51
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和阐述科学 共产主义原理的开始	67
第三章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	82
黑格尔对“异化”范畴的解释	85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对一些科学方法论 原则的阐述	101
第四章 新社会学的根本原则	133
马克思对社会劳动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 义的分析	138
马克思对“人的感性”的唯物主义理解的阐述 和对理论与实践统一原理的论证	149
结论	162

第一章

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著作 对《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的解释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最初，它只是部分地发表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三卷上，后来又转载在192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三卷上，标题均为《〈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出版者没有料到，他们出版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和付印的一部独立著作的手稿。因此，这部手稿作为《〈神圣家族〉的准备著作》出版的第一个版本，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1931年1月，在苏黎世出版的一家社会民主党的月刊上，刊登了迈尔的一篇简短的报道，说是新发现了马克思的一部早期著作。^①1932年，这部手稿经过整理，用德文发表在克吕纳版《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②一

① J. P. Mayer Über eine unveröffentlichte Schrift von Marx (迈尔《关于马克思的一部未发表的著作》)，载《红色评论》，苏黎世，1931年1月。

② Karl Marx,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

书的第一卷上，标题为《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马克思本人没有给《手稿》加上标题)。这个版本虽然增补了俄文版中所缺少的几章，但也是不完全的。直到1932年那一年的晚些时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在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三卷上全文发表。这时可以算是《手稿》的“合法”存在的开始。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曲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错误观点就在西欧广泛流传，这种观点根本歪曲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真正内容。

《手稿》德文版的最初出版者朗兹胡特和迈尔在他们的《导言》中把马克思的这部新发现的著作吹得神乎其神，说它是“新的福音书”，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隐秘的含义就象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那样不折不扣地显示出来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他们极力要证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位出版者死死抓住那些被马克思赋以新的革命内容的费尔巴哈旧术语，想把《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上的主要关节点，而在这个关节点上，经济分析的原则都是从人的真正现实性这个观念直接推演出来的”^①。按照他们的意见，《手稿》是“包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视野的唯一文献”^②。

在谈到他们吹捧《手稿》的真正原因时，他们特别称颂这部著作的所谓“中心”思想，说这个“中心”思想就在于：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否认“通过剥夺者的剥夺来实现生产资料的社

① 《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1932年，第XIII页。

② 同上书，第XXVIII页。

会化和消灭剥削，是历史的真正目的”^①，而相反地认为“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现”^②才是这种目的。显然，他们感到非常亲切和可以理解的正是这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Γ·德曼在他的《新发现的马克思》^③一文中，也首先极力强调“新发现的手稿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过程和全部含义具有决定的意义”^④。他认为手稿的特殊作用在于，“它比马克思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加清楚地揭示了他的社会主义情绪背后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⑤。德曼写道：“这个马克思是位实在论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抛弃了哲学唯心主义，并没有使他用物质的最高实在性来对抗观念的、虚假的实在性。不如说他使这二者仅仅从属于既被动又能动、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无所不包的生活现实的总体。他把物质的原因和观念的原因，都看成是统一的、总体的生命过程的现象。而且，在他看来，不是物质原因所已经导致的结果，而是生命力的全面展开，才是这一过程的终结，而生命力的全面展开则相反地导致从一切物质事物统治下的解放，其中也包括从生产需要下的解放。”^⑥不难看出，在这一切装腔作势的词令背后，隐藏着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修正主义倾向。

但是，德曼也感觉到，不能撇开马克思作为坚定唯物主义

① 《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1932年，第XXXVⅡ页。

② 同上。

③ 见《Der Kampf》（《斗争》杂志），1932年第5、6期。

④ 同上书，1932年第5期，第224页。

⑤ 同上。

⑥ 《斗争》杂志，1932年第6期，第272页。

者的观点的其后发展的历史，而简单地根据《手稿》来推论整个马克思主义。于是他提出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关系问题。“这种人道主义观点是在后来克服了，还是始终是马克思学说的确定不移的前提？”^①这位作者在这样直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敢毫不含糊地明确回答这个问题，而企图从“后门”偷运自己的观点。他写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重新深入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发展史。”^②但是他立即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那种把《手稿》看作是还不成熟的青年时代的作品”^③的看法。从他的观点看来，这种看法会把考察问题的两个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方面混淆起来。他写道：“这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确实刚刚进入产生的阶段，而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前提则已经在同黑格尔主义决裂的过程中找到了完全成熟的完美表达。”^④

此外，德曼还认为，整个《手稿》“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就创作质量来说，马克思成就的顶点是在1843年和1848年之间”。他写道：“切不可高估马克思的晚期著作，相反地，这些著作显露出他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马克思虽然做了超人的努力，但并不总是能够克服这种衰退和削弱。”^⑤按照德曼的意见，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地在于他同疾病和物质贫困的斗争，部分地则在于“1848年以后马克思由于对自己的预言一再陷于绝望而产生的愤怒和冷酷的情绪，而这些预言本来是由于在他那个时代时机尚未成熟而

① 《斗争》杂志，1932年第5期，第27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275—276页。

⑤ 同上。

不能实现的”^①。

他既然这样毫不费力地“证明”，1844年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他所赋予它的那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所谓“还未遭到1848年和1871年糟蹋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他也可以抓住一些未尽完善的术语，并利用当时马克思世界观的实际上的不成熟性，来毫不困难地偷运自己的观点了。

德曼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成是马克思的某种“自白”，说它道破了“那些作为他后来一切著作的基础并包含着这些著作的隐秘含义的、最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和伦理价值”^②，企图借此把伦理社会主义冒充为“真正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

Γ.马尔库塞也跟着这种论调一唱一和。他在他的《论新发现的马克思手稿》^③一文中也认为，这部手稿“给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起源和本来的真正含义，提供了完全新的基础”^④。从他的观点看来，《手稿》的特殊意义，就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看成是一般人，而不是仅仅看作一定阶级的代表、生产的主体等等。^⑤

用不着详细分析这位作者的立场：他的立场实际上同我们在上面所分析的那位作者的立场毫无区别。这种观点的反动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在过分推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目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

① 《斗争》杂志，1932年第5期，第275—276页。

② 同上。

③ 见《Die Gesellschaft》（《社会》杂志），1932年第8期。

④ 《社会》杂志，1932年第8期，第136页。

⑤ 同上书，第140页。

一切主要的和本质的东西早在1844年就已经创造出来了，而马克思主义往后的全部形成史不过是一种每况愈下的运动，并没有揭示出什么本质的、主要的东西；因此，这部往后的发展历史的合理内容本身只能而且必须从“这个顶点”来加以理解而不是相反。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曲解《手稿》的真正内容，使《手稿》成为评价马克思整个世界观的基本标准，从而歪曲马克思主义，阉割它的革命精神，把它描绘成伦理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隐藏在这种观点背后的是对《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本身的歪曲，即牵强附会地强调《手稿》中表明当时马克思世界观还未成熟和尚不完善的个别因素，而闭口不谈那种突破旧术语的框子并决定马克思往后许多年的理论工作方向的新的革命内容的全部丰富性。人为地硬把《手稿》同马克思后来的全部理论著述割裂开来，是能够进行这种歪曲的基本前提。

早在三十年代《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刚一问世的时候，右翼社会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歪曲就是极其嚣张的。后来，在霍克海默尔、阿多诺、莱泽冈格和波皮茨等人的著作中，这种歪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成为资产阶级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支点之一。

在战后年代，由于思想斗争的急剧尖锐化以及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危机的日益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又在寻找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办法和手段。他们一面完全把右翼社会党人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所进行的投机当作武器，一面进一步歪曲这些著作的意义，企图从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立场来曲解这些著作。

神学家^①蒂尔以《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这样一个露

骨的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科伦版^①所写的一篇篇幅很大的评注，特别清楚地表现出这种倾向。蒂尔紧跟他的右翼社会党前辈强调说：“《手稿》的特别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部使马克思的较晚期著作成为问题并揭示出它们的意义的著作。”蒂尔写道：“马克思的原文使人无须较晚期著作的帮助，就可以对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有一个最好的、有根有据的概念。”^②他在这里特别预先说明：“没有《手稿》所提供的那个指导线索，就根本不可能理解较晚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尽管这里所展开的前提在马克思的较晚期著作中也存在，但这些前提在那里是表述得模糊不清的，并且是不容易抽出的”^③。

从这位作者的观点看来，《手稿》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提供的那个“指导线索”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新东西”。原来，这个“指导线索”就是：《手稿》揭示了“对人本身的本质和任务的理解”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④的主要源泉这一事实。《手稿》证明，马克思在制定他的“洞察自然界、社会和历史领域的创造活动和终极目的”的世界观的时候，把“人及其生活意义”即“哲学—社会学的人本学”^⑤提到中心的地位。

一个世纪以前，人本主义作为费尔巴哈和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世界观中的哲学学说，曾经是唯物主义的形式之

① K. Marx, Die Nationalökonomie und Philosophie (《卡尔·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科伦—柏林，1950年。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4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9页。

一.可是在现代条件下,蒂尔所捍卫的人本主义原理已经成为西方流行的一种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哲学——存在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了。

存在主义者把“存在”(Existenz)看作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人的生活领域是符合这一概念的唯一实在的存在领域,因为只有人的生活这一领域中才有那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的“存在”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一领域中才有痛苦、烦恼、体验和死亡等等。从存在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心理体验的总和还构成整个现实界的普遍基础。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一切存在形式,各种物质物体的运动,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发展规律等等——这一切都不过是对象化了的人的体验这种整个现实界的真正人本主义潜台词的特殊形式。

这种观点,作为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的最新变种之一,必然同非理性主义的说教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不管存在主义者怎样歌颂经验、真理、实践,实际上他们的整个观点却在极力诋毁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和人的理性。存在主义者用诡辩的手法玩弄主体和客体在认识中的辩证法,妄图证明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完全融合的真正的“存在”可以为理论思维所认识,并且把“实际体验”、“直觉”等等同科学的认识、同理性的理论抽象活动对立起来。

显然,这种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既跟整个马克思主义相敌对,同样也跟青年马克思的观点相敌对。虽然如此,这些批判马克思的现代存在主义者却企图用这样的精神来曲解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

蒂尔也从这个角度来说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演变。他断章取义地从《莱茵报》、《德法年鉴》等等时期的马

克思早期著作中抽出个别的命题，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①、“思想……是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②等等，说这些命题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得以开花结果的马克思的存在主义观点的萌芽。

无可争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的一部还不成熟的著作。这部著作对许多最重要的、根本性的哲学问题的论述，还同这种论述后来所具有的那种经典的形式相距极远。这种不成熟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术语方面。在这部著作中，还有很多从黑格尔、特别是从费尔巴哈承袭下来的术语，这些术语显然不符合于已经赋予它们的新内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新内容模糊起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就利用了这一点。他们硬拿青年马克思的术语来冒充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隐秘内容，故意抹煞或者歪曲马克思思想的真正含义。

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人的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基本形式的本质和内容，极其深入地考察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到如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就起源来说的）及其发展的最高产物，在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日益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使整个周围世界成为运用自己的精神力和体力的领域。人的劳动赋予自然界以第二个生命，并且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自然界越是为人的活动所占有，它就越是通过劳动这个洪炉，变成“劳动的人的作坊”，变成“被劳动所人化了的”自然界。存在主义者抓住马克思的这些还表述得极不确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4页。

有时甚至非常含糊不清的命题，宣布马克思是把自然界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看作“人的无机的身体”等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存在主义者。这样一来，这些思想的深刻的、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就被完全歪曲了。

蒂尔在分析马克思对人的感性、即人能动地认识外部世界的的能力时，就正是这样干的。马克思在《手稿》中证明，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等等）不单纯是自然界的赐予，如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在劳动中，在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中产生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历史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①；“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②

这位存在主义的批判家利用青年马克思所使用的未尽完善的术语，断章取义地抽出这些思想，牵强附会地把这些思想同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拉在一起，企图借此证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不过是从人的感性派生出来的某种第二性的东西。这是对些论点的完全任意的解释，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人所创造的对象和人的精神力量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劳动所创造的对象发展人的精神力量、感觉，而后者则提高人生产劳动对象的能力。蒂尔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发挥的关于人在劳动过程中同自然界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78—79页。

统一和相互作用的整个观点，是一种“关于人的本质的本体论的学说”^①，换句话说，是一种关于整个自然界的普遍人本学基础的学说。这实际上是在故意歪曲这些思想的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涵义。

来自新托玛斯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批判家也采取同样的手法。他们也对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一点感到不舒服。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意识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于是他们便极力想把马克思拉到自己的哲学阵营里去，硬要证明在马克思的观点和“圣托玛斯”的信徒的观点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利用存在主义者站在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对青年马克思的著作的歪曲来达到这个目的。

新托玛斯主义者霍梅斯在他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写道：“那些习惯于把马克思评价为古典唯物主义代表的人，显然将因为我们把马克思列为古代神秘的、二元论的诺斯替派路线的代表而感到惊异；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就是这个路线在西方的一个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分支。”^②

这位作者还在另一个地方写道：“亚里士多德—托玛斯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思想，都讲的是同一个东西。”^③据说这两方面都认为，“人在自己的思维中用思想和对象创造的任何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都必须把它看成是思维和被认识了的对象性的最高存在方式；所以，从另一方面

① 《卡尔·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和哲学》，第88—94页。

② J. Hommes, Von Hegel zu Marx,《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des Görres Gesellschaft》(霍梅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载《格列斯协会哲学年鉴》)，下卷，慕尼黑，1953年，第388—389页。

③ 同上书，第392页。

来说，物和人的存在本身是某种并非固有、并非真实的东西，因而也是应当加以排除的”^①。

他既然能发出这种谬论，那么下述论点也就并不出乎意料了：“马克思关于对象世界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所持的有根据的怀疑态度，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密切的血缘关系。”^②不止是霍梅斯一个人妄图制造这种血缘关系。天主教哲学家穆尼埃写道，必须使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调和起来，“这是最近几年的最重要任务”^③。狄尔克斯也企图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并想证明马克思在他的人本主义学说方面是接近于基督教的。狄尔克斯认为，青年马克思同基督教的唯一根本的分歧点，就在于马克思“不承认单个人的人格绝对意义”^④。他写道：“对马克思说来，重要的是发现整体的真理，因此在他看来，决定着存在的最根本的现实是处于辩证自我运动过程中的人类社会，而在基督教看来则是天父，我们大家就都是天父的孩子。”^⑤

存在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从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立场上对青年马克思所做的歪曲，其社会根源是相当清楚的，它的反动意义也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辩护论者为了使人民群众

-
- ① J. Hommes, Von Hegel zu Marx,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des Görres Gesellschaft»* (霍梅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载《格列斯协会哲学年鉴》), 下卷, 慕尼黑, 1953年, 第392—393页(着重点是我加的。——巴日特诺夫)
 - ② 同上书, 第390页。
 - ③ E. Mounier, *Introduction aux existentialismes* (穆尼埃《存在主义导论》), 巴黎, 1947年, 第90页。
 - ④ 参阅W. Dirks, *Marxismus in Christlichen* (狄尔克斯《从基督教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47年, 第125页。
 - ⑥ 同上。

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争取社会权利、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惜利用任何意识形态手段。必须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引起了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疯狂仇恨。霍梅斯写道：“基本的本体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巴日特诺夫）力求使人相信，他不仅必须改造自己的行动和思想，而且必须改造事物和人的给定的存在。它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世界的存在和自然秩序本身就是坏的，是罪恶的根源；不应当把人，而应当把世界的创造主和自然秩序的创立者，宣布为罪魁祸首。这是关于人想望得到……解救和医治这种真正需要的惊人误解。”^①

新托玛斯主义者企图证明，万恶之源在于人，在于人的宿命的二重性，在于人的精神本性的本来缺陷。因此，对于外部条件、整个社会的任何改造，都根本不能改变人的命运；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不可重复的、单个人的存在。

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不得不通过象朗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顽固而恶毒的敌人的嘴无可奈何地承认：“马克思作为哲学家在目前拥有最大量的信奉者。”^②他们已经不能象从前那样抹煞马克思主义，不重视它对千百万人的思想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了。因此，他们妄想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某些不成熟的思想、某些人本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的因素，作为论证自己理论的论据，也就毫不足怪了。他们继承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衣钵，把这些因素加以神圣化，极力想把这些因素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抛掉作为目前全世界无产阶

^① 霍梅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第393页。

^② M.G.Lange, *Marxismus, Leninismus, Stalinismus*（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图加特，1955年，第12页。